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 内涵、演变与建构^{*}

尹继武

【内容提要】 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战略思维；单边默契；搁置；大局；共识；南海争端

【作者简介】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89）。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7.04.00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 (2017) 04-0033-29

^{*}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7）的最终成果之一。感谢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张洁、吴文成和《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和意见，文责作者自负。

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后，中国一直奉行这一政策理念，维护南海和平大局。^①从2009年起，中菲在黄岩岛对峙，中国和越南在渔船、油气开采等方面也是摩擦不断，近些年来，南海主权争端矛盾已经激化，危机升级。中国的政策举措，也逐渐改变过去的被动应对，而是到现今的主动调整以及战略规划。^②尽管在外交政策文本以及声明等方面，中国仍旧是奉行过往的和平、合作与发展的路线，同时恪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但其实际战略举动、博弈等均体现了新的特点和思维。^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南海主权争端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要么是从相关行为体的战略诉求出发，分析各国的态度及其变化，同时剖析各种影响南海争端的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相关对象国的南海政策和战略分析，而较少将中国作为分析对象；要么是从技术层面入手，比如国际法、能源开采、渔业捕捞等，分析在实际操作层面各方的矛盾及其合作的可能性等。^④而对于中国南海政策和战略的相关分析较为少见，大部分也是基于政策的历史描述、现实困境等外部分析。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并没有系统地从行为体的战略思维层面分析各行为体对于南海争端的政策思维及其模式，更没有从政治心理和战略互动层面，细致剖析这些战略思维是如何与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与南

① 李金明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洁 《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变》，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25-31页。

③ 国际学术界也出现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在南海等周边争端处理中变得越来越自信，“富于进攻性”，但对此论点是存在各种争议的。参见 Michael D. Swaine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5 (Summer 2011), pp. 1-29; Thomas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54-6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Spring 2013), pp. 7-48.

④ 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在此只进行宏观路径的提炼，仅列举部分重要作品。吴士存 《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张明亮：《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编委会主编 《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曹云华、鞠海龙主编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2012-2013），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2013年版；John W. Garver,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Quarterly*, Vol. 132, December 1992, pp. 999-1028; Michael A. McDevitt, M. Taylor Fravel and Lewis M. Stern, “Littoral Project: South China Sea,” CNA Publications, 2013,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IRP-2012-U-2321-Final.pdf. 张明亮对2011年之前的南海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海外、越南等方的成果，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和评价，参见张明亮 《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1-46页。

海地区争端的相互影响。^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的战略和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比如,美国政策界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可能与美国、菲律宾和越南产生冲突,中国的政策和活动以两种方式挑战南海的稳定和安全:其一是挑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既有条约,对现有的南海秩序框架产生影响;其二是挑战各国海军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行动和演习以及搜集情报的权利,影响南海的资源框架。^②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海政策与战略行为的争辩,集中于中国的行为类型及其选择机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试图解析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及其理由,即妥协与升级的不同机制,为此他区分了三种策略:合作、妥协与拖延。而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与行为其实集合了不同的策略,武力使用可以作为拖延的一种策略工具,而合作与妥协也是并存的。^③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中国南海政策的分析,多为叙述“搁置政策”的来龙去脉、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少数分析涉及中国南海政策的转型以及对于搁置政策的反思。但这些研究仍局限于宏观战略和政策层面,并没有深入到战略思维及其转变的微观分析。^④

对于南海议题,中国有没有一种系统的战略思维?在不同时期这种战略思维是如何变化的?战略思维主要是指对于特定领域(政治生活和事物)的本质特点、策略性手段平衡等战略性问题的思考及其模式,笔者在批判国内外战略文化研究

① 较少的例外是,国内外仅有少数谈及中国南海战略的文献,且多为战略政策和文本分析。参见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3 (January 2011), pp. 292-319.

② 相关典型观点可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聚焦南海——近年国外南海问题研究译文集》,刘琳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3 (January 2011), pp. 292-319; Andrew Taffer, "State Strategy in Territorial Conflict: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7, No. 1 (April 2015), pp. 85-108.

④ 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岳德明《中国南海政策刍议》,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55-62页;杨泽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困境与出路》,载安应民主编《南海区域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5页;薛力《中国应加快调整南海政策》,载[英]《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744>。

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单边默契的战略思维理论。^① 鉴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综合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对于南海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冷战结束以来的事实进行归纳。第一，提炼出一种宏观的、贯穿于中国处理南海主权争端的战略思维内涵，即在南海议题上中国的战略思考特性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第二，基于基本的类型学分析，揭示中国的战略思维在不同阶段的演变及其动力是什么。第三，从战略思维与战略选择的互动逻辑出发，分析中国的战略思维调整是如何被各种因素所影响的。

一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

战略思维是指战略政策和行为背后所反映的对于政治的本质看法以及战略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思考。由此，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南海争端的本质看法；二是如何解决南海争端，关于战略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力量与道义的平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的思考。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基本的分析对象即中国政府，包括领导人、权威媒体以及知识精英等多个层次的重要政策与言论；还可以通过中国在具体的战略情境中的行为反推中国的战略思维。总体来说，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是单边共识或默契的一种经验表现，它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个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南海争端的本质看法也是倾向和平的。^②

第一，搁置。对于南海问题，总体上的战略性解决办法在于搁置（或者拖延）的办法。主要的政策性表述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搁置政策起源于邓小平关于中日领土争端的表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建交时，双方并没有着意去解决历史上的领土争端，都采取默示的办法，将有争议的领土先行搁置一边。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出钓鱼岛问

^① “单边默契是指行为体在处理政治、战略或军事问题或与其他行为体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战略思维，即行为体基于自身的理性战略考虑（比如战略利益算计、国内政治考虑或问题解决能力），或基于文化认同因素（比如文化与认知习惯、情感和地位考虑），单方或双方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实际上存有差异的共识、问题解决的策略，而行为体一方或没有公开否认默契存在，或双方均没有公开否认共识。”参见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第 10 页；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7-204 页；Shih Chih-yu and Yin Jiwu, “Between Core National Interest and a Harmonious World: Reconciling Self-role Concep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1 (February 2013), pp. 59-84.

^② 关于中国战略思维中单边默契的基本内容，参见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第 14-18 页。

题，邓小平表明“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争议”。“这样的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①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关于搁置争议的最早政策表述。^②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接见美国大学代表团时以及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对于主权领土争端问题，更好地就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和平解决争端，采取共同开发的政策。根据官方更为明确的材料，1986年6月和1988年4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菲律宾总统时，曾经谈及过南沙群岛问题，系统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主权属我”的原则，这是之后所认为中国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成型的、较为清晰的表述。^③

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正式确认之时。在中国总理访问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时，进一步表述了这种理念。而1992年上半年的全国人大新闻会议上，中国正式确认了对于南海争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④随后，这一战略一直沿用至2009年前后，成为中国对于南海争端处理的官方正式表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南海争端的多维度思维特性。其一，关于时间的观念。搁置争议的思维是一种对于时间的非紧迫态度，因此，对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时间来换取更为成熟的时机。同时也可能是基于中国力量的不足，需要时间积累问题解决以及管理和开发的力量。其二，拖延的特点。尽管搁置的政策意图是好的，即为了双边的关系发展以及维护和平的局面，双方不应纠缠于主权争端问题。但是，搁置战略的成型及其成为中国的主导政策，凸显了中国在战略上将问题拖延，而不是立即解决的态势。其三，搁置也是为了发射中国的和平意图信号以及维护双边利益的考虑，即共同开发，在实际利益上可以协商、分配，但在原则问题（主权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② 张明亮的研究认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能最早起源于1975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华时邓小平的谈话，但目前尚无中方的公开资料可以证实，只有菲方外交官的回忆材料。参见张明亮《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7-1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1227页。

④ 《人大会议发言人姚广对中外记者说 民主求实团结鼓劲是大会主旋律》，载《人民日报》1992年3月20日，第1版。

问题) 上, 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①

第二, 大局。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 无论实际的政策表述, 还是战略行为, 都坚持一种整体优于部分的哲学。具体来说, 以双边关系的其他发展为重, 比如建交、经贸、华人华侨问题等作为优先目标, 南海问题不着急解决。比如, 从搁置理念的提出之时就可以看出, 邓小平认为双方均约定不谈及如何解决领土的争端, 而以其他重要的双边要务为重, 即建交问题。这里所讲的“大局”, 包括很多层面的维度。既有国家层面的发展是第一要务, 也有改革开放的总体事业, 中国处理南海领土争端的政策和措施, 必须放在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之下, 因此总体来说, 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均是一种被动和应激的方式。^② 这也进一步引申出, 中国一直强调要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合作和友谊之海。这些都是话语层面的表述, 体现了中国的政策主张, 基调就是保持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同时也是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为了达到和平与发展的目的, 中国的“搁置”政策、主张和平的意图, 都是试图化解双边的矛盾。同时, 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外交也承担着塑造双边的政治关系、化解争端、增加友谊的目标。比如, 中国通过加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 试图促进和加强中国 - 东盟的政治信任和伙伴关系。应该说, 这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自从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负责任的举动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③ 同时, 从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互动中, 也可以经常看到, 在主权争端凸显、危机上升之时, 中国往往通过加强经济上的双边发展 (2011 年中国邀请菲律宾、越南领导

^① 主权原则一定要坚持, 但在具体形式以及处理与利益关系时可以灵活。这一点可能来源于中国近现代主权丧失的悲情历史以及政治社会化教育。理解这一点, 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如何处理主权争端和纠纷。在这方面, 观众成本的解释具有一定说服力。“一国两制”的主张也体现了这一特性。

^② 在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座谈会上, 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 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参见钱彤、李学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

^③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 载《外交评论》2011 年第 4 期, 第 21-39 页。

人访华，签署双边经贸协议，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做法），争取对方在南海争端上接受中国的立场，包括和平的解决态度、搁置的办法以及承认、认可中国所提出的倡议。最后如能形成和发表双边的联合声明，那么就是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最终目标之一。这就是接下来所需要讨论的中国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性。

第三，寻求共识。中国寻求与相关争端方的双边共识的路径，要么是寻求让对方接受中国所提议的问题解决思路，要么是双边的谈判和妥协，要么是在多边领域，中国逐渐接受东盟的实际措施（措施表述有差异、东盟自身有分歧等）。^①总之，重要的目标在于确定共识、不断地宣称和巩固共识，发展共识。中国寻求整体上的局面稳定（和平、合作与和谐）是符合中国整体战略目标考虑的。南海问题的凸显，也就是共识不断被单边破坏的过程，而后双边的博弈，包括外交舆论战、经济战和威慑等，都是试图重塑共识，或发展新的共识的过程。

寻求共识，是国际关系或对外交往中的一项基本外交目标。因为国际合作的形成必须建立在部分或完全的共识基础之上。^② 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时，对于共识的追求，其外在的表现有如下形式：其一，注重双边或多边领域的共识的形成。因此，在针对主要的双边关系中，比如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的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双边的联合声明较为常见，甚至有些年份，在一年之内会有两份联合声明。如此多的联合声明，说明中国十分注重从外在的政策一致性方面试图对双方的政策基调进行协调。联合声明的政策一致性表述形式，表明中国努力将外交谈判和协商作为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主要措施；反之，如果偏好使用武力的方式，那么共识或联合声明的地位不会那么重要。在多边领域也是如此，主要表现为中国努力保持与东盟伙伴关系的建设，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动制定相关的准则。其二，共识的形成表明了默契的一个外在认可的维度，但这并不表明，双方的联合声明所达成的共识就是真正的双边默契或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与菲律宾、越南，还是与其他小国所达成的共识，往往只停留在宏观的原则性

^① 中国一直主张双边解决南海问题，但最后还是与东盟协商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国际多边条约在某种意义上会约束中国自身的行为，因此中国在考虑签署时会进行必要的成本效益分析。基于中国自身实力和利益的考量，中国并不会完全接受东盟方的《南海行为准则》。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于2011年7月签署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导方针。参见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3页。

^② 共识对于国际合作和战略互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参见[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Winter 2000), pp. 1-39.

的表述，比如双方争取以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以双边关系的发展为重等。^①从对象国来看，相关国家没有必要对此原则进行否认，而且即使给予承认和认可，也只是顺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原则而已。^②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理念，实际上早已成为“搁置争议、单方开发”。即使对于“共同开发”这一维度，相关国家也是理解不同，这些国家都倾向于理解为在对方所占有的“争议区域”进行开发，而不是自己所占据的海域。从实际的政策互动来说，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于中国的“搁置”争议，并没有给予很多的回应，如此说来，中国的搁置理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政策表述，并没有获得对方的一致认可。唯一的共同开发实践，就是从2005年开始的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方在海上的联合地震勘探工作，但到2008年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因素，共同开发也陷入僵局。

综合来看，我们试图从共识/默契的角度观察，提炼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思维特性——共识或单边默契。双边对于共识的理解仅局限于非常宏观的层面（和平、合作、大局等），而对于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歧很大，或各自表述，或存在相当多的单边行动等。因此，这种共识往往只是一种虚假的共识。从中国的认识来看，中国对于搁置、大局和共识的追求和倡议，其基本动因来自理性和文化两方面。理性层面就是客观的战略需求，即基于力量不足和时机不成熟等，而文化层面则决定中国的南海战略追求是整体的和谐与和平以及地区的稳定。^③从是否认识到默契的虚假性来看，中国的愿望应该是希望展现自身战略政策的真诚性，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但是，相关国家基本上没有接受中国的倡

^① 杨泽伟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困境与出路》，载《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编委会《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5页。

^② 基于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需要，或美方的压力，或其他战略性的考虑，相关国家在一些情境下会表面上与中国形成共识，稳定双边关系。这种现实和理论预期也是国际关系平衡理论的观点。参见 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4。

^③ 石之瑜对此的文化解释是关系平衡取向和追求。基于维持长期关系和谐的目标，可以在某些局部和短期利益上进行妥协，换取双方关系的和谐与和平发展。但同时也取决于对于对方意图的判定，如果判定为恶意，那么可能会破坏关系，惩罚对方。参见石之瑜《国际关系平衡理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关前沿论坛第1期，2015年10月28日。

议。^① 这表明中国和相关其他各方均认识到,对于这些基本的政策主张,并没有进行正确的归因,相关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具有诚意的,因此以加快开发和占领南海争议岛屿为先,而中国也逐渐认识到这些国家不断的挑衅和占领事实。

二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演变

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到现今为止,中国在处理南海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突破“搁置”思维。但是,中国的单边默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由先前的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逐渐演变成基于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

(一) 搁置战略思维的理性动因

中国的搁置、寻求共识南海战略思维的提出,在第一阶段受到特定的内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第一,力量的不足,包括军事力量不足以投射到南海,难以从力量上解决南海问题。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于越南和菲律宾侵占南海岛礁的反应中就体现出来了。根据当时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曾生的回忆,由于中国在海上的力量不足,导致中国对于越南等国的非法侵占行为只能采取外交层面的抗议行动。^② 因为中国的舰队并不具备深入南海内部巡航的能力,也导致了中国无法通过岛礁的巡航、宣示以及开发来进行主权的宣示和巩固,因为这些都必须要有的相应的海事能力的支持。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并没有太多改观。因此,从军事力量来看,中国的搁置和全局思维,其实就是基于现实力量的基础所提出的延缓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压力主要来自陆上而非海上,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海事与海军力量发展较慢。这直接体现了战略理性的特点。

第二,历史上,中国工作重心和重心在历史上并不是放在南海上。在冷战期间,南海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点议题,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维护更为

^① 1992年,中国倡议与越南合作开发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与美国克里斯通(Crestone)能源公司合作开发的万安北区域;1994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马来西亚时提议共同开发,均未得到积极回应。参见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万安北事件,外方给予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参见[英]比尔·海顿《南海》,林添贵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193页。

^② 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610页。对于20世纪50-70年代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冲突的更为详细分析,参见张明亮《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7-86页。

重要的是陆地边界冲突以及台湾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更为紧迫，已经导致相关的国际危机和冲突，比如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以及台海危机等，同时这些问题也都与历史遗留问题相关。^① 因此，从紧迫性来看，南海主权争端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急迫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中国在技术力量方面的不足。由于南海潜在能源的发现，导致相关国家开始加快单方面的侵占岛礁行动。侵占岛礁进行单方面的开发，无论是能源开发，还是旅游开发，或者是进行移民开发等，都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比如，岛礁或南海区域离陆地较近，交通方便，这一点对于菲律宾和越南来说都是优势。如果要进行能源开发，必须具备在南海进行深海开发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要么是通过自己的技术研发，要么是与其他国际能源跨国企业进行开发合作。南海争端其他相关国家，都是通过与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等国能源企业在内的国际能源巨头进行合作开发。在 2012 年之前，中国一直不具备深海能源独立作业的能力，^② 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或者联合其他争端国家合作，或者与国际能源企业合作。但是，由于中国并不想打破南海的既存现状（无论这种现状是和平、搁置争议、单方面开发，还是共同开发），中国唯一的一次国际联合开发尝试是 1992 年的万安北计划，但却因越南的极力反对而搁浅。

第四，从矛盾的主次方面来分析，南海主权争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中国看来是处于次要方面，而主要方面是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良好的关系。所以，这种哲学观也决定了中国将次要矛盾先搁置一边，争取与相关国家达成谅解和约定，积极发展双边关系、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但在此期间，1974 年和 1988 年中国和越南在西沙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局部冲突的现实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的海洋安全与海军战略对于军事手段的强调。而到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中国已转变为外交手段优先的战略。^③

第五，综合主观和客观条件，中国领导人认为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时机并不

① 即便中国和越南存在海上权属问题，但在中越建交之时的谈判过程中，当时着重点是柬埔寨问题，而中越建交后首先的关注点是陆地边界问题。参见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唐家璇《劲雨煦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海洋石油 981：南海深度取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5/15/c_123131730.htm。

③ 苏冠群《中国的南海战略》，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2-138 页。

成熟，从而采取了搁置和拖延的战略。^① 在这种战略思维下，中国一方面试图避免矛盾和问题的激化，同时试图在外交话语上坚持中国的主权所有，而在利益分配上试图通过利益均沾的方式，让相关争端国家在获得谅解和利益均沾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客观性的因素导致了中国对于对方的单边行动一直都是抗议，即局限于话语层面。从实际的战略考虑来说，将条件不成熟的争端暂时搁置，先行发展其他重要的议题，比如建交、发展战略性关系、经贸等，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②

第六，中国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对于整体大局优先于部分的考虑，对于合作与和谐的追求等。这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理解，对于整体与部分、和谐与冲突的辩证关系中进行思考。基于政治与文化的视角，中国的搁置、大局和共识思维，也是受到整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文化习惯所影响的。

（二）南海战略思维定势及其缘由

第二阶段，基于战略理性而提出的单边默契（搁置与寻求共识），在不断地经过中国南海/东南亚外交的实践之后，可能会在政治场景中得以沉淀，从而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从具体时间上来看，20世纪70-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初步构想了搁置、大局与共识的理念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逐步成型，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不断重复提出这种倡议，试图得到这些国家的积极回应，同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场合也正式加以确认。这表明，先前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逐渐确立为中国处理南海主权争端的政策和战略。^③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3年前后，中国的南海战略一直是由这种搁置、大局和共识的理念所主导，中国领导人在访问相关国家时，在南海问题上都是延续搁置争议的战略。根据我们的判断，先前

^① 笔者认为，这种搁置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参见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3 (January 2011), pp. 292-319; 张清敏 《中国解决陆地边界经验对解决海洋边界的启示》，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4期，第1-16页。

^② 这方面的论证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常识，而且大部分学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推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经验。参见万霞、宋冬 《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制度——从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思想说开去》，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6期，第34-4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的战略理性单边默契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① 21世纪初，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一种精神理念，确立为解决周边领土争端的主要政策。“在南海争议等问题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特别要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深入人心，积极研究共同开发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② 搁置战略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政策，是一种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南海争端解决战略，至少在公开政策辩论层面是不容许被挑战的。这种理念已经成为一种外交政策习惯，我们习惯于将此作为南海解决的原则、批评对方的措辞等。搁置思维成为中国南海战略主导的战略理念后，其积极的政策效果就是中国与东盟政治信任的增长，如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建成；其消极后果就是相关其他各方的单边开发与侵占，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害，而这恰恰又证明了搁置思维已成为中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但它并未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得到及时调整。对于这种战略思维类型的转变，其内在动力可能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第一，短期的有效性进而证实了这种思维的正确性。尽管我们并不在于对中国的南海战略进行价值评价，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单边默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短期来看，中国的单边默契具有积极的战略效果，比如保持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了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关系（建交、经贸等），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政治信任的增长等，如中国与东盟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③ 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因此，短期内的积极战略效果事实上能够不断地自我证实和巩固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的正确性，因为它带来了地区局势的稳定、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提升了南海战略思维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有助于促使它成为一种政治标准和习惯。

第二，能够自我不断获得道德的正义性（和谐、合作等）。尽管我们的分析表

^① 这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战略思维定势，包括经济促安全的战略思想。关于中国外交中思维定势的反思，参见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32页。

^② 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001年8月6日），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③ 21世纪初，中国与东盟及相关国家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中国的战略理念，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经济促外交等。参见季玲《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37-46页；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明,中国适时提出的南海战略是基于特定的中国力量基础的,但是,这种战略思维还是体现了特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追求,尤其是道德层面的诉求。^①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对于整体上和平、和谐与合作的追求,成为中国南海战略的一个总体目标,因此部分的利益和矛盾必须服务于总体上的稳定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南海战略事实上也可以归结为一种“维稳”的战略,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对于道义和道德的战略目标追求,客观上会让人居于一种道德的制高点,这种制高点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身的道义优势,同时也会让中国不断地获得道德的自信。尽管这种道义的付出,可能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实际利益收获,甚至是遭受到利益的损害,比如共同开发成了单边开发,而中国的经济外交并没有改善相关国家在南海上不断挑战现状的战略举动。但是,不断的道义自我宣示和强调,能够让中国获得道德层面的心理满足感。^② 这种道义的自我正反馈,将先前的战略理性逐渐注入了更多的道德和道义内容。

第三,自身调整的困难。从理论上来说,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和大局战略,是基于中国的战略力量和时机等判断而提出的一种理性战略思维。既然是基于客观的实力,那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调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军事力量和能源开发实力也不断增长,中国以往的南海战略实际上已经与当前的实力不相符合。但是由于特定的政治结构,如果说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战略)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的话,那么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会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不能打破先前领导人提出的政策),由此会导致短期内南海战略的调整,只有领导人自上而下打破这一标准,才能规避对“政治正确”的指责。^③ 如上文所述,单边默契思维的固化,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习惯,则会带来政策思维定势和现实困境,由此产生了一个成本承担问题。谁来承担这个成本以及如何进行成本转移和调整,成为影响战

① Dominik Mierzejewski, "From Pragmatism to Morality: The Changing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Suijian Guo and Baogang Guo, eds., *Thirty Years of China-U. S. Relations: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175-195; Chih-yu Shih,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② 这也是中国战略思维中的单边默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与西方学者基于现实主义(物质和利益)观察角度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道德、地位和身份追求,是一个重要的动机维度。

③ 这种政策习惯和思维定势,可能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决策权力特性相关,即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操作,而非充分的社会讨论和反思等。

略思维调整的重要因素。^① 另一个层次，中国南海战略中的搁置和大局意识，无论是否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但中国已经过长期一致的国际表态，这样会造成一定的国际观众成本。比如，中国强调搁置争议，那么，中国又如何能打破现状，不搁置争议了呢？中国强调共同开发，如果中国单方面开发的话，是否会陷于舆论的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对于搁置、大局和共识的追求，客观上是一种自我束缚的政策举动，为自身的政策选择设定了框架，从而使得中国的战略调整面临更多的成本。^② 但是，这种逻辑也表明可能有利于中国南海战略的国际可信性，因为中国的政策宣示是具有较高的观众成本约束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一方的政策表态，对方可能并不能正确解读并加以归因，因此这种政策表态实际上限制了自身的选择。

从战略理性到文化认同，中国的单边默契或南海战略思维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如果现行的战略思维（政策）得以调整，那么其动力机制是什么呢？

三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调整的机制

从2009年起，南海局势重新激化，南海主权争端成为一个突出的热点地区问题。这既包括来自相关国家加快了侵占和开发岛礁的步伐，也包括美国等域外大国的积极介入。2012年4月，中菲在黄岩岛对峙，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中国和越南因为油气开采、渔船等问题关系紧张，而越南国内的反华情绪及游行等活动在近些年也达到了一个高潮。^③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河内表示南海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中国确保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而国际社会也一直炒作2010年所谓的“中国将南海列入核心利益的范畴”等。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在南海争端局势中面临一个重大的风险和危机期。中国对外战略规划重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并对海洋权益的观念以及周边外交思维进行了调整。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在南海议题上已经由之前的被动转为更加主

^① 感谢吴文成在评论中指出战略思维固化所带来的成本承担问题，这事实上可以与观众成本以及政治合法性等理论相结合。

^② 恐怕这是一种负反馈和非本意后果，这类似于政治生活中的系统效应。参见 [美] 罗伯特·杰维斯 《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国际危机组织 《南海翻波（二）：地区反应》，亚洲报告 No. 229，2012年7月24日。

动,同时中国外交也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① 中国领导人关于海洋维权、核心利益维护的战略思维的调整,由此导致了中国战略选择的变化。南海争端的升级,中国利益受损成为战略思维调整的外部环境,而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往的单边默契不能继续维系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危机升级,而中国在多个方面加强或凸显了实力的变化,从而使得战略思维调整得以顺利进行,这些方面包括战略决心的加强、社会情感的支持以及相应实力的发展,战略思维调整的外在政策表现就是国内政治的整合。

(一) 调整与领导人的战略判断: 战略决心的增强

领导人对于被动局面的主动调整主要是调整之前的单边默契,主动打破这种默契,从而以实际行动逼迫对方接受新的共识和新的格局。正如先前我们所论证的,由于中国的单边默契战略思维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很容易转化为一种政治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那么,战略思维的转变,更倾向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整过程。这就是说,从2009年起,中国开始塑造新的海洋权益意识,并赋予海洋安全一种新的战略高度,增强了海洋强国和维权意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海洋和周边外交工作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维稳和维权之间平衡的重要性。根据相关的研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风格上更加自信和积极。^② 这种自信和积极,既是由于领导人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而同期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大环境相关。新一届政府更为主动地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和主张,同时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理念进一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积极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战略决心也得以强化。^③ 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调整。根据该会议的新闻简报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将先前的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周边外交方针,调整为以经

^① Xuotong Yan,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Summer 2014), pp. 153-184; Yaqing Qin, "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3 (Autumn 2014), pp. 285-314.

^② He Kai and Feng Huiyun,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3 (Autumn 2013), pp. 209-231; 林民旺:《习近平外交的五大风格》,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zlwj/article_20140618108014.html.

^③ 国际危机组织《南海翻波(三): 稍纵即逝的降温契机》, 亚洲报告 No. 267, 2015年5月7日, 第6-12页。

济利益和道义建设并重的方针。^①同时，针对过去更多的消极处理争端模式，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周边外交更为积极主动，无论是双边的外交联系，还是多边的外交倡议，中国都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努力。比如，外交“西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新丝绸之路建设和“互联互通”等，都成为近期周边外交的重要新议题。

中国政府对于海洋权益和维护海洋、领土核心利益的战略观经历了一个逐渐调整和提升的时期。2009年，针对中国周边地区政治安全更加复杂、南海局势升温的形势，中国对传统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最为重要的是，强调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在正确区分和把握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的基础上，全面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将“切实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作为当前和今后外交工作的战略重点之一。^②针对周边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出了“要正确把握维权和维稳的关系，稳妥处理我国同周边国家海洋权益、领土、跨界河流争端，既对有关国家侵害我国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捍卫我国核心利益，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维护我国周边稳定大局。”“要更加重视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抓紧制定我国综合海洋战略，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③随后，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战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和维权能力的战略方针。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突出“建设海洋强国”的主题。在中共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高度。这表明，中国对于海洋权益的重视，不仅是受到外在客观局势的挑战而为，也是一种主动谋划，受到追求威望和地位的驱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部分。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要进一步关心海洋、

^①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② 胡锦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工作能力水平》（2009年7月17日），载《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246页。

^③ 胡锦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工作能力水平》（2009年7月17日），载《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244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载《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5页。

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① 综上，自2009年起，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转变是建立在中国对于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认识变化基础之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维护海洋权益，加强能力建设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凸显了战略决心的加强。实际上在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转变中，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即均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但更为凸显了战略手段和策略的转变，从先前消极搁置转为中国积极主动作为。

从更为宽泛的层次来说，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的战略选择时也更为主动积极。无论是中日的钓鱼岛之争，还是中菲的黄岩岛争端以及中越的南海争端，中国的战略姿态更为稳健和积极。虽然起因都是偶然事件，或者是对对方试图改变现状，但中国的战略举动表明，中国不消极避退，而是争取通过战略博弈，达到让对方承认争议存在，强化中国在事实上对于争端岛屿的巡航等主权宣示行为。自2009年起，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在南海的主动攻势，成为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调整的外部环境，从而导致了中国先前的战略共识或单边默契战略的破裂，致使南海地区危机升级，凸显了南海单边默契的负面战略效应。危机局面的凸显，是一种外在因素和导火索，而不是成为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转变的原因，尽管这体现了被动变化的一面。^② 我们基于外部的观察，认为中国领导集体在对于周边主权领土争端的本质看法以及战略手段选择上有较大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之前的单边默契战略。^③

（二）调整与国内社会基础：社会情感的支持与压力

由于领土争端牵涉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那么，如果经过政府和媒体的塑造，中国在南海领土上面临损失的叙事表述的话，社会层面的反响和压力会较大，对于上层的政策调整造成一定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国家的战略决心。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已悄然兴起，不仅发挥着对外发表强硬声音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维护自身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焦点还是在中国与西方霸权，尤其是美国霸主之间的抗

^①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31/c_116762285.htm。

^② 张洁 《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变》，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29页。

^③ “奋发有为”成为新的中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一种理念指导，尽管官方尚未出台政策文本给予定位，但从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和学术界的讨论来看，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共识。参见李颖 《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1月14日。

争。这种情绪以《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随后的中美对抗为集中爆发点。^① 在当时的南海主权纷争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并不是特别明显。21世纪以来，在领海的主权纷争中，尤其是东海和南海的争端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越来越强烈。2005年的全国反日大游行、抗议日本“入常”以及在中日钓鱼岛对峙的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力量及其情绪也是风起云涌。^② 2009年南海冲突激化以来，在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以及中越在南海的冲突过程中，中国实际上都运用了舆论动员的战略手段。具体表现为，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的言辞较为强烈；允许新闻媒体对冲突的事态进行跟踪报道；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进行了舆论战，以支持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外交博弈。^③ 在新的时期，民族主义情绪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对于中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从南海争端的近期升级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平台和途径，既包括了传统的官方权威表态，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对于事件的判断和抗议等，《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关于南海争端本质、事实以及中国态度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兴的媒体领域，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大量的表达。在网络媒体中，比如对于黄岩岛事件，新华网、新浪网等都设有专题报道，追踪事件的动态发展。而在当下中国最为反映网民舆论的微博和微信中，关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讨论也是非常多。从实际行动来看，尽管越南在2011年以来各种反华的行动和舆论特别高涨，甚至对在越的华人和中资企业等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在中国，南海争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上升到民众游行、抗议、甚至抵制等较为激烈的层面。

其二，典型冲突案例中的民族主义。从2009年以来的南海争端升级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斗争集中在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国家。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上台执政后，其反华亲美态度明显，在南海争端也加紧了侵占中国岛屿的步伐。比如，菲律宾2009年向国际法庭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通过《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岛屿划入菲国领土范围之内，同时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军事合作，等等。^④ 2012年发生

①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② Jessica Chen Weiss,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1 (Winter 2013), pp. 1-35.

③ 左希迎《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35-54页。

④ 李金明《中菲南海争议的几个问题及其变化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41-48页。

的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将中菲南海争端的矛盾暴露无遗。总体而言，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有理有力，通过外交舆论和实际行动，对黄岩岛形成了实际控制的局面。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的巡逻机发现中国12艘渔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作业，因此派出该国最大的军舰围堵中国渔船，而中国方面赶来的两艘海监与渔政船阻止了菲方抓捕中国渔民的举动，从而形成了中菲对峙的局面，随后中国最为先进的渔政船310号前往黄岩岛海域巡航维权。为了表明中方和平解决的诚意，同年4月22日，中国先后撤回了两艘渔政船。中菲双方对峙两月有余，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实际上达到了常态化巡航的目标，从而实际上控制了黄岩岛。^① 中菲黄岩岛对峙，在中国民众层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响。通过相关的案例分析，中国民众舆论的表达主题是爱国主义、要求对菲强硬，微博舆论的关注焦点为：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不受侵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美外交等。民众对中菲黄岩岛事件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之情，并不是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在原则上，民众和政府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民众的期待更高，希望政府提出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和举措。^② 有几点观察值得关注：其一，微博等民众舆论的释放，是得到政府的同意和许可的，不然民众难以获得信息，进行爱国情绪表达。其二，民众的爱国情绪，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他们的高度期待也是政府所预期的。由此可以做出以下判断：中国对南海战略思维是处于转型之中，表明舆论与政府是良性互动关系。而人民网等官方媒体在此次事件中，也是积极主动作为，“摆明态度、澄清事实，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舆论、遏制事态升级，树立政府威信。”^③

中越在近年南海争端中冲突较多，而且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最多，越南侵占中国岛屿也最多。2014年，中越在中国“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事件上产生冲突。同年7月15日，中国提前撤走在南海海域建设中的“海洋石油981”钻井。此前，越方认为中国的钻井平台是在有争议的区域钻井作业，故而一直进行骚扰。从2014年5月起，中方开始海上钻井作业，越南方面就派出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量船只，冲撞中国政府公务船，同时派出蛙人水下特工，布放渔网、漂浮物等。据统计，到2014年6月7日17时，越方派出船只最多时达

① 曹云华、鞠海龙主编《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166页。

② 赵婷婷《微博舆论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以“中菲黄岩岛之争”微博舆论为研究的视角》，载《东南传播》2012年第12期，第45-47页。

③ 王欢、黄悦《“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载《今传媒》2012年第12期，第42页。

63 艘，冲闯中方警戒区和冲撞公务船累计达 1 416 次。越南还纵容国内反华势力，上街游行示威。5 月中旬，数千名反华分子对包括中国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打砸抢，杀害四名中国在越公民，伤三百多人，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中越关系在党际、政府、经济和民间呈现不同的态势。981 平台事件“进一步恶化了两国民间的情感，已经损害到双方的经济联系”。^① 中国政府在进行 981 钻井作业上属于主动的行为，^② 但从中国政府的处理来看，中国极力保持克制的态度，中方通过各个层级与越方进行了三十多次沟通，但越方仍不停止干扰活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表态为，“越方在国际上制造争议的图谋不会得逞。越方采取的任何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越方自身的利益。越方当前应该做的是放弃幻想，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动并撤走现场所有船只，使海上尽快恢复平静。”^③ 从中国民间反应来看，民众对于越方的干扰及反华行动有所知闻，相关媒体均有报道。民众的态度仍以爱国主义表达、国家认同为基础，要求政府强硬应对，维护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基于政府的克制态度以及维护中越友好大局的考虑，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对待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是有分化之策略。重点在于菲律宾和越南，而与马来西亚则保持合作与稳定的局面。基于这种判断，对菲律宾和越南的应对战略偏向于维权，而对马来西亚则偏向于维稳。针对菲越以及域外大国采取抱团联合战略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也有一些新变化，如战术更加自信，使用力量的方式更加多元，战略上也主动出击，在多边平台上积极发声，比如香格里拉对话会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均是坦言分歧，陈述中国立场和利益。^④ 对马来西亚的舆论相对克制，其背后反映了政府的控制能力以及塑造的策略。这种考虑是基于分而化之的策略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在战略层面，中国也将先前只接受双边的解决，调整为双轨思路，即南海争端由当事国之间友好协商，而南海和平由中国和东盟维护，表明中国在战略思维层面开始有条件接纳多边的机制。^⑤

^① 《“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63255.shtml。

^② 国际危机组织《南海翻波（三）：稍纵即逝的降温契机》，亚洲报告 No. 267，2015 年 5 月 7 日，第 4-5 页。

^③ 《2014 年 6 月 5 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162553.shtml。

^④ 左希迎《南海波澜再起，中国不再投鼠忌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6 月 11 日。

^⑤ 《“双轨”思路和“五个坚持”是解决南海问题办法》，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04/c1002-27410490.html>。

其三,如何看待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与战略思维转变之间的关系。战略思维(权力自身)的调整,或是准备调整的意愿,需要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同时,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层权力的战略思维调整具有主动的影响和塑造作用。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有两派观点:一派强调权力的完全主动性,即把中国看成是没有公民社会独立性的国家,而且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由政府所塑造的;另一派则强调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其自身产生的逻辑,也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①综合我们对民族主义和战略思维转型的关系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三点更具规律性的特性。

第一,由于民族主义更多是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国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它是塑造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和身份以及构建中国政府合法性等的基础。所以,民族主义情绪既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同时在现实中也有强大的生命力。最为重要的是,在涉及民族利益和情感问题上,如果领导人退让的话,那么可能会受到特定的观众成本的惩罚。这也体现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观念。^②第二,民族主义情绪及其表达,不仅取决于它对于领导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价值,更取决于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一般来说,如果在中国对外谈判和交往过程中,需要社会层面的强硬声音支持,那么民族主义情绪有其爆发和出现的机会;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及其表达更多的矛头指向,应该是集中于对外关系及其对象国等,而不能转而指向谴责中国政府的软弱以及进一步质疑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及其程度,取决于领导人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掌控力度和程度如何。第三,总体来看,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仍是在政府领导人的掌握的前提下。但是,这种社会情绪的表达对于政府是有一定的决策影响力,其影响力大小取决于领导人的掌控能力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与政府决策偏好的吻合程度。^③从南海争端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表达来看,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对外强硬的社会声音,其前提是中菲和中越争端的升级,因此并不是民

^①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Wang Zhe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参见王军《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Jessica L. Weeks,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1 (Winter 2008), pp. 35-64.

^③ 这种领导精英与社会公众的情绪吻合度,是表明其是否产生并发挥影响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

族主义情绪引发了争端，而是争端引发了社会情绪，社会情绪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外交姿态。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消解，也是随着中国与相关争端方达成谅解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仍只是从属于中国战略思维调整，而不是推动和引发者。

（三）调整与实力对比变化：中国实力的发展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调整最为重要的基础是中国自身力量的增长，包括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海军的投射能力、资源开发的能力等。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南海战略最初的提出是一种战略理性的考虑，即基于力量不足寻求搁置的办法，而“共同开发”倡议理念的提出，除了基于和平善意的文化考虑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海地缘条件不利和恶劣天气，无法保障后勤供给和钻井平台安全，中国深海钻井和开采技术的薄弱也是重要因素。当然，技术力量的不足，并不能直接从政策话语中推论出来，因为政策宣示更多是基于友好和平的倡议。^①但是，从21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开始，中国无论从整体国家实力，还是具体的军事实力和能源开采技术力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实力以及实力对比发生逐步、甚至是根本性变化时，最终会影响到战略思维的转变。

其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这是中国战略思维变化的一个最为宏观的实力变化背景。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仍保持8%以上的年高速增长，而且政治保持稳定，新旧领导集体也实现了和平过渡。特别是2007年从美欧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世界，但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错，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也更加凸显了中国模式的自信。当前，国际关系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之一为中美何时权力持平，甚至中国何时超越美国的话题。

其二，从军事实力的发展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国防开支的预算也逐渐增加，凸显出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军事力量建设步伐加快的一面。虽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投入仍是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但中国的发展为

^① 即使笔者持这种看法，也不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也可以从近期习近平关于中国外交义利观的表述中加以分析。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义利观具有道德理性的特点，而并不认为道义是利益和物质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① 比如,中国的远程航行能力、军事保护能力得到增强,这可以从中国军舰开始在非洲海域进行海外利益保护看出。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于2004年立项开始建设,到2011年8月,中国航母平台完成首次出海试航;2012年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主流分析均认为其将首先编入南海舰队。2017年4月26日,中国首艘国产航母001A型航母下水,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近些年中国航空军事力量发展迅速,比如航母舰载机、隐形飞机歼-20等的闪电亮相,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军事力量在21世纪初以来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军事技术和力量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国家实力、特别是物质力量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它也是由中国的贸易和人员等海外利益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在中国利益走向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海洋战略从近海走向远海战略的转变,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和行为也应当放在中国海洋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加以理解。

其三,南海深海开采技术的根本性突破。由于南海恶劣的环境,中国之前的深水钻井能力只能达到505米水深,只是国外水平的1/6。中国一直在筹备超深水(1500米以上)的项目,但由于钻井设备问题,该项目一直未能开展。由于南海恶劣天气以及中国深水设备的短缺,南海深海油气开发也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一直倡议合作开发。2012年5月9日,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正式开工,这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深水战略迈出了实质性步伐。981平台的最大作业水深3000米,最大钻井深度可达10000米,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② 与此同时,中国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也获得了水下试验成功,2011年“蛟龙号”水下5000米海试成功,2012年7000米级海

^① 中国官方白皮书对于中国军队建设的相关情况给予了全面和详细的说明。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3年4月,北京。另可参见《2010年中国的国防》(2011年3月)、《2008年中国的国防》(2009年1月)、《2006年中国的国防》(2006年12月)、《2004年中国的国防》(2004年12月)、《2002年中国的国防》(2002年12月)和《2000年的中国国防》(200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 <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

^② 史三东《走进“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平台》,载《国防科技工业》2012年第6期,第52-54页;李响《“深水战略”的坚实一步——聚焦“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首钻成功》,载《国土资源》2012年第5期,第16-17页;薛理泰、赵刚《拨开迷雾,拆散对方联盟为先(上)——谈如何打破南海僵局》,载《领导者》2011年第41期,第15-16页。

试任务圆满完成。^① 中国钻井开采能力的实质突破，为中国对南海能源进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说明，中国具备了在自身领海、包括有争议的领域油气开发的能力。因此，联合开发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也不一定需要联合国外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作业。

综上所述，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政治经济发展稳定迅速的背景下，军事力量建设和投入也是稳步前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实质性深海开采技术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已经投入使用，这从基本的物质实力基础上为之前的战略思维调整奠定了基础：实力的变化必然促发上层的战略思维的改变。

（四）调整的国内政策效应：国内政治的整合

由于部门利益，中央和地方对于南海问题的诉求不同，政策偏好也不同，所以，相关利益部门会不断试图推动中国对于南海政策的调整，积极影响上层的战略思维转变，而且会制造很多突发的局面和争端，逼迫政府着手处理。这是由下而上的影响南海战略思维的调整机制，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政府南海战略思维发生转变的话，会进一步带动国内部门和利益的整合。

第一个层面，南海由于涉及海事、公安、渔政、能源等诸多领域的行政管理，所以，一般认为南海海域相关的政府执法部门包括“五龙治海”的执法格局。具体为隶属于农业部的“中国渔政”、隶属于海关总署的“海关缉私”、隶属于交通部的“中国海事”、隶属于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的“公安海警”和隶属于海洋局的“中国海监”。^② 甚至有研究认为，中国南海执法队伍是“九龙”，甚或“十一龙”，还包括地方政府、人民解放军海军、外交部等，但是缺乏一个中央协调机制。在上述执法部门中，涉及南海争端的主要是海监南海总队和渔政南海总队。这些部门对于国内的政治决策有较大影响，比如预算方面的申请，争取更多执法权力。21世纪初以来，海监和渔政的大型海事监管船只、渔政船和执法人员都有显著增加。^③ 海军在争端处理过程中实际上很少直接参与，更多是这些执法部门的介入。虽然中国海上执法队伍提升了相应的执法能力，但仍存在不足，比如船舶吨位普遍比较小，自卫能力不足，导航设备不够先进等等。而且，执法队伍各

^① 《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冲击7000米深度》，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2-06/24/c_112277916.htm。

^② 江红义《试论海洋综合管理的层次性》，载《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编委会主编《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91-119页。

^③ 国际危机组织《南海翻波（一）》，亚洲报告 No. 223，2012年4月23日。

自为政、多头执法,造成管理、技术和信息各自为用、相互封闭,难以形成合力等。^①但是,由海事执法部门出面处理南海的危机,又具有一定的好处,即造成的冲突影响较小,可控性强,但也造成了冲突门槛过低的尴尬。总而言之,中国海上执法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竞争,既增强了中国的海上执法能力,也引发战略思维的调整。这种相互部门利益的冲突,不利于建设海洋强国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目标,中国“需要有一个综合、统一、高效的海洋管理部门”。因此,这也促使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机制整合的举动,如2013年重组的国家海洋局至少部分整合了行政执法力量。^②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到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家海洋局重组方案,2013年7月22日完成重组的新国家海洋局正式挂牌,“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耕海洋战略、强化海洋管理的坚定决心”。^③

第二个层面,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与南海资源开发和争端紧密相关的主要为广东和海南两个省。^④当地政府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将南海的开发和资源利用作为当地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比如沿海地方政府在近些年都陆续公布了海洋经济发展计划。在开发南海的地方政府计划当中,主要的方向为渔业与旅游。地方政府通过鼓励渔民往更深海域处捕鱼,实行各种奖励和优惠政策。而旅游业也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地方经济策略,一方面,需要向中央部门申请,在诸如西沙群岛等地开发高端旅游项目;另一方面,三沙市的建制问题也是地方政府长期的愿望。三沙市建制成立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98年,但由于越南的反对而作罢。这些努力获得部分成功后,又会引发越南等方的强烈反应,由此导致外交层面的危机。三沙市的建制终于在2012年7月完成,但西沙的旅游高端项目则反复波折,旅游项目的走走停停,也反映了上文所述的不同部门利益差异与纷争的

① 江红义《试论海洋综合管理的层次性》,载《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编委会主编《南海区域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2号),国家海洋局网站, 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gwyfgwj/201307/t20130709_26463.html。

③ 吴颖《构筑蓝色中国梦——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重视海洋事业发展记事》,载《中国海洋报》, http://www.soa.gov.cn/xw/ztbd/2014/wsznq/ywdt/201407/t20140722_33229.html。

④ 更为详细的分析,参阅国际危机组织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参见国际危机组织《南海翻波(一)》,亚洲报告 No. 223,第19-21页。

结果。^① 这种外交上的反复试水举动，彰显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特性，同时也表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逐步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建制、商业等行动来加强和巩固对领土主权的声索。

第三个层面，国内不同的石油公司对于南海能源的开发。^② 由于能源对于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且南海经常被媒体渲染成“第二个波斯湾”，所以南海区域成为各大国有石油公司潜在的开采对象。但基于种种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限制，当前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开采大部分都集中于近海，而深海和有争议海域尚未得到系统的开采。由于主权争端的因素，各大石油公司实际上是谨慎行事。开采成本也是非常高，不仅包括技术和经济成本，还有各种不可预测的政治和外交风波，因此近期内南海并未成为中国国有能源公司开采的重点。1992年，越南的抗议导致中海油公司放弃了与美国克里斯通（Crestone）能源公司的合作计划；2009年，中石化公司也终止了琼东南盆地南部的一个勘测项目。但是，近几年中国深海能源开采技术的突破，为中国能源公司走入南海深海的能源作业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虽然政治和外交风险仍然存在，但是国有能源公司在技术改善的支持下，必将进一步对先前的战略思维形成压力，不断有各种挑战或对先前默契的试水事件。2014年的“981事件”可能就属于一类。^③

总体来说，国内不同部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歧以及能源企业的诉求，对于塑造一个统一有效的南海战略和政策执行，会造成客观上的不利局面，进而影响到海洋权益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这会使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对相关国内部门和利益进行整合。由此可见，国内政治和利益的博弈是中国南海战略思维调整的一个客观环境，会促发国家战略思维的调整，而国家战略调整反过来将进一步整合和塑造新的国内格局。

^① 三沙市设立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越南国会通过了《越南海洋法》，宣称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因此，三沙市建制既有政治上的主权宣示，也有经济上的开发之意。《三沙市正式挂牌成立，专家：南海丰富资源待开发》，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724/c99014-18586528.html>。

^② 国际危机组织《南海翻波（一）》，亚洲报告 No. 223，第21-23页。

^③ 薛力的判断是，技术能力的突破为共同开发提供了基础和前景。笔者对此的判断恰恰相反。力量和实力的改变，会引发之前战略思维和措施的变革，而不是进一步巩固先前的搁置和共同开发思维。参见薛力《中国为何提早撤走981钻井平台》，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353>。

四 结 论

根据学界主流的观察,自2009年起中国政府在当时所爆发的中菲和中越南海冲突中的处理方式,彰显了中国的南海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先前的被动坚守(搁置、退让、联合开发倡议等),转为更为积极主动的巩固权益和维护权益。虽然目前并无正式的中国南海战略政策文本可循,但通过中国政府官方系列的外交政策言论和行为处理,还是可以总结出中国南海战略的若干特点。本文的分析基于历史的动态归纳,试图抽象出中国对于南海争端处理的战略思维特点及其变化轨迹。我们试图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出发进行几点小结。

第一,力量以及理性战略的重要性。传统上,对于中国外交及其战略的动因是文化还是利益理性之争,产生了不同的回答及其理论。^①通过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梳理,我们发现理性战略仍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思维基础。在第一阶段,中国的单边默契对于和平、稳定以及合作的追求,产生了搁置、联合开发以及合作主导的政策理念,这背后其实也是基于中国自身力量以及南海地区权力结构所决定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也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外交关系。所以,中国在坚持原则——即主权原则之下——试图通过双方的合作来管控和维持现状局面。而后,近期中国对南海战略的积极调整,当然是建立在周边外交的反思基础之上,但最为重要的动因还是实力的变化。无论是中国自身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从技术层面中国深海能源开采技术的突破等,都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南海地区有效行使主权及其能源等开采业务。实力的变化,也包括战略决心、社会情感支持以及国内整合等成为战略思维转变最为根本的基础。^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及其预期的。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快侵占、开采的步伐,也是建立在这种政策的预期基础之上。基于这种判断,未来南海争端格局、中国的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当然,中国政府的政策声明也体现了超越权力解释的一面。这也是阎学通所主张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本文的逻辑不是权力增长必然导致中国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甚或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而是力量的变化会对战略思维产生影响。但是在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中对于道德追求,仍是权力界定道德(利益),或为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责任等。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

政策解决措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基于实力及其对比的基础。^① 实力变化会引发南海格局的重组，在系列的政策和外交互动以及国际危机之后，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而这个平衡就是考虑到双边关系的平衡及和谐等。

第二，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变化的螺旋式特点。从历史动态来看，中国基于实力、客观条件、时机以及文化等因素，适时提出的战略思维及解决方式，尽管我们称之为单边默契（因为中国的战略或策略，也很难成为相关国家的共有默契），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周边外交的进展，先前基于战略理性而提出的单边默契战略思维，会在政治和外交实践中不断沉淀，从而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文化传统。其现实政策表现就是，对于南海主权争端，中国长期坚持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若干基本原则，而没有根据现实、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等进行调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一直成为中国南海战略的核心内容。根据本文的分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尤其是东南亚外交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因为稳定了双边关系发展和化解争端，为其他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的许多政策举措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发展经贸上的相互依赖，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增长，等等。但是，战略思维的固化、自身难以调整，是一种基本的特性。而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时期，受国家海洋战略成型、民族主义情绪、国内政治力量的促动以及中国自身实力的变化等因素的促进，从而引发了战略思维的变化，其外在表现就是政策的调整以及行为模式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并非是完全对立或彻底的，仍然体现了战略思维的惯性和连续性。从连续性来看，中国仍然在周边外交和南海争端的处理中，以双边合作以及大局为重，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义利观”的强调，仍体现了中国进一步注重道义的一方面。^② 所以，由此可以观察，中国的南海战略的调整体现出一种螺旋式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调整的动力实际上是打破之前的单边默契，重塑一种双边的默契或共识。总归，

^① 这并不表明，传统中国的道德理性，即道德的目标等，并不会继续发挥作用。参见 Shih Chih-Yu,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习近平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参见《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待最后的尘埃落定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格局，中国新的南海战略思维得以重新确立其主导的政治地位，从而成为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基本原则，经过政治与外交实践的磨炼又会重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与习惯。这将重演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基于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转化过程。

另一方面，无论是战略理性还是文化认同，或许中国战略思维的内容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可能一些内核价值将成为重要的主导精神，比如对于合作与和谐的追求。^① 这似乎又将我们带入一种类似于道德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即目标的道德性以及手段的适当现实性的结合。

第三，中国的南海战略思维的国内基础问题。南海战略思维的演变，充分体现了中国战略思维的变化逻辑和特点同时受到国内力量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南海主权争端，既牵涉到利益的纷争，即国家利益的博弈：南海能源和资源、航行等战略地位，同时也是关切到中国的文化和情感，即南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主权的归属牵涉到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历史及其屈辱的情感；同时，由于相关争端各方都是周边的小国，而又有域外大国的介入，其实更能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如何处理与小国的争端的战略模式。基于陆地边界和海洋主权争端解决的差异性以及中国作为走向全球的世界性大国，从长远来看航行自由和开放的海洋更有利于中国，所以在未来海洋主权争端解决中，对于上述理念的考量也会更加凸显。^② 中国南海战略思维中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比如对于共识的追求、搁置思维、和谐的价值等，不仅具有理性的动因，更是一种区别于西方主导的制度、机制和多边的价值诉求，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特性基础。最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起源和调整，都离不开国内基础的驱动，比如自身力量发展、国内发展的环境需求，国家战略调整的海洋大战略基础、战略决心增强、国内社会情感基础和政治整合动因等。这说明，理解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在未来的变化调整，需要构建一个更为完善国内基础变化的视野。

【收稿日期：2017-03-02】

【修回日期：2017-04-17】

【责任编辑：谢磊】

^① 这一判断与文化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稳定性的观察是一致的。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钟飞腾《国内问题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95-115页；钟飞腾《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21-36页。

old order arising from the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bservers point to an array of strategic choices for middle powers ranging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or hedging to engaging. Some of these observers argue that middle powers will use different means to play a stabilizing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dual hierarchy since they stand to benefit from the hegemonic stalem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rategic choices available for the so-called middle powers are largely constrained by the climate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argument rests on the premise that middle powers are less choice makers than choice takers when they come to strategic alignment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asic bargaining theory is used as a heuristic device to illustrate the logical underpinning behind this argument.

[Keywords] China , United States , South Korea , dual hierarchy

[Author] J. James Kim , Research Fellow , Asi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Lecturer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Columbia University.

33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South China Sea: Concept ,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YIN Jiwu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 studi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focus more on the policies of target countries ,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pecifically China's relevant policies than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ing of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multi-dimensional one. It mainly focuses on setting aside the disputes , taking the big pictur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eeking consensus among relevant countries , which emphasizes a positive attitude of China toward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It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featuring spiral changes from a unilateral consensus based on strategic rationality to a unilateral consensus based on culture identity. The solidifica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subject to positive feedbacks of specific policies , moral justness and political culture habits and it will be actively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power structure ,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boosted strategic resolve of the leadership. This paper ha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va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and a desirable resolution of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Keywords] strategic thinking , unilateral consensus , shelving , overall situation , consensus ,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uthor] YIN Jiwu , Professor , School of IR and Diplomacy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 100089) .